

“影子教育”研究述评： 需求、效果及公平性讨论

翁秋怡

[摘要] 课外补习教育又称为“影子教育”，是一种全球关注的教育形式。本文从家庭微观教育决策的视角，对影子教育的家庭需求、学生接受影子教育的效果等国内外有关研究进行综述。基于已有研究，国家教育发展状况等宏观因素以及家庭、学校和个人层面等微观因素共同影响家庭对课外补习教育的需求，并且接受影子教育的效果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最后，作者尝试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对已有的研究结果进行解释，讨论补习教育的公平性，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影子教育；课外补习教育；课外补习需求；课外补习效果

课外补习教育作为与主流学校教育平行的一种教育形式，已经成为全球普遍的教育现象。2004年，中国的小学到高中各教育阶段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分别达到74%、66%和53%（薛海平和丁小浩，2009）。韩国的补习比例更高，分别为83%、75%和56%（Kwak，2004）。香港初三和高三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比例达到53.8%和71.8%（Bray et al.，2014），日本初三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比例达到65.2%，越南高中学生参加补习比例达到77%（Dang and Rogers，2008）。亚洲地区的课外补习参与比例普遍较高，其他地区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英国6到11岁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达到26%，13岁的学生参加比例达到30%，非洲国家如毛里求斯、肯尼亚，小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达到80%以上（Kulpoo and Soonarane，2005；Onsomu et al.，2005）。2001年土耳其的课外补习支出水平基本赶上正规的公立学校支出水平，课外补习支出达到GDP的1.44%，而公立教育支出为2%（Tansel and Bircan，2006）。

马克·贝勒（Mark Bray）将课外补习教育称作影子教育（shadow

[收稿日期] 2016—12—20

[基金项目] 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家庭行为对子女教育获得的代际效应研究”（15CSH011）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翁秋怡，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电子邮箱地址：qiuyiweng@pku.edu.cn。

[致谢] 感谢2015—2016年度“联校教育社科医学研究论文奖计划”的资助。

education)。课外补习教育依赖于主流学校教育，其规模和形态因主流教育的变化而变化，就像影子离不开实物一样，因主流教育的存在而存在。与主流学校教育相比，课外补习提供更多的个性化辅导，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种私人教育。课外补习以收费为基础，教育形式灵活，不仅包括一对一的辅导，也有班级教学；教师不仅有专职的教师，而且包括大学生，退休教师、大学教授和社区成员(Russel, 1997)。

课外补习教育的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已有的研究主题包括微观家庭子女的课外补习教育参与和家庭课外补习支出、课外补习对学生学业表现影响的评价，本文意在对已国内外有关课外补习教育的研究进行综述，并对这一主题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一、“影子教育”需求研究

私人课外补习需求的研究可以通过是否参加课外补习、课外补习的时间以及课外补习的费用进行衡量。市场化的补习教育存在于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外，其供给和需求一方面受宏观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家庭微观决策的影响。标准的经济学理论解释了影响家庭教育需求的因素，包括家庭收入、对教育的偏好、子女接受教育的回报等，这些因素解释了不同家庭教育需求的异质性。

(一)宏观因素

国家经济和教育发展程度是影响“影子教育”需求的一个主要原因。一些国家在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私人课外补习会增多(需求和供给)，例如中国、越南和一些非洲国家和东欧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家庭的实际收入增加，家庭会在学生的教育和其他产品上支出更多(Bray, 1999)。Baker 等(2001)使用 41 个参加 TIMSS 测试国家的数据，发现国家的公共教育支出占 GNP 的比例和毛入学率越高，课外补习相对较少。一个教育支出相对较少和入学率低的国家，比在高度发达和大量教育的国家的课外补习更普遍。

文化因素也是一个主要因素。Bray(1999)指出在“强调努力”的国家中课外补习更加普遍。许多亚洲国家，受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努力是未来成功的因素”，家庭对课外补习需求比较强烈，而在欧洲和北美文化中更强调个人能力。而且，许多亚洲国家认为学习是竞争性和有身份意识的，这影响人们对校外教育的需求。

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就业之间的关系也会导致更多的课外补习。如果教育和就业的关系密切，会刺激教育竞争，父母会增加课外补习以帮助子女进入更有竞争力的学校。由于考试存在高风险，对高等教育入学准备的需求会更

多(Bray, 1999; Stevenson and Baker, 1992)。在台湾,这种观念很普遍,学生们参加课外补习为大学入学选拔做准备,这种进入大学的优势决定了他们未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成功。然而,Baker等(2001)发现相反的结论,他使用1994—1995年TIMSS数据分析了41个国家,发现课外补习和存在高风险的测试之间没有关系。此外,在劳动力市场中,如果企业和政府更加依赖文凭信号,会推动家庭课外补习的需求。

国家对教师的激励机制也影响学生的课外补习参与。Silova等(2006)研究发现公立学校中教师的低工资和微弱的激励性导致教师推动学生进行课外补习,创造辅导市场以增加他们的收入,私人课外补习变得教师导向的而不是学生导向的(Bray, 1999)。在越南,尽管政府禁止独立于学校系统的课外补习,但是教师经常组织家庭辅导以提高他们的收入,通过对8岁学生的课外补习调查发现,46%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Ha and Harpham, 2005)。

(二)微观因素

Dang和Rogers(2008)综述了课外补习需求的微观因素,发现家庭支出、父母受教育程度、城市地区、学生年级和学业成绩等因素的作用明显。归纳起来,这些因素包含家庭层面、学校层面和个人层面。

1. 家庭层面

课外补习属于私人产品,一定的经济条件是获取这种资源的基础。Kim和Lee(2001)使用1997年的数据发现韩国家庭课外补习的收入弹性为0.5。Tansel和Bircan(2006)使用1994年的数据发现土耳其家庭课外补习的家庭支出弹性为单位弹性。中国大陆城镇家庭教育补习支出收入弹性小于1(薛海平和丁小浩,2009;丁小浩和翁秋怡,2015),高中生教育补习支出弹性为0.183(雷万鹏,2005)。在香港,家庭月收入提高1.0,家庭月辅导费支出提高0.067(Bray et al., 2014),对大多数地区而言,课外补习支出缺乏弹性,这种私人化的教育辅导是生活必需品。然而,在不同的收入分位数上,课外补习参与的作用和收入弹性存在差异。家庭收入最高分位数的课外补习收入弹性为0.5,而最低分位数的收入弹性为0.98(Kim et al., 2010),也就是说,家庭收入越低,其课外补习支出的收入弹性越大。

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往往具有良好的文化氛围,不仅如此,较高文化知识的父母也有能力辅导子女的课程学习。但同时,这样的家庭也往往有着较强的支付能力。双重作用下高文化层次家庭如何决策呢?张羽等(2014)的研究发现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课外补习的时间越早。Bray等(2014)对香港的研究发现,父母的教育水平对是否家庭有私人辅导以及课外补习费支出没有影响。但在韩国,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课外补习参与越高,而且对英语辅导的影响大于数学辅导。在土耳其,父母高受教育程度

的家庭支出了更多的课外补习费用,并且母亲的影响大于父亲(Tansel and Bircan, 2006)。Kim 和 Park(2010)的研究还发现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课外补习支出的影响在不同收入分位数上有显著的差异,其中最高的分位数群组的作用为 19%,而最低的分位数群组的作用仅为 7%。家庭社会经济背景是影响课外补习教育需求的首要因素,

来自高社会经济背景家庭的子女参与课外补习的概率更大,课外补习支出更高(Stevenson and Baker, 1992)。家庭资本多的初中生获得补习机会更多并且对补习教育的投资更大(薛海平和李静, 2016),并且经济资本对初中生补习支出影响大于家庭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通过父母职业、受教育水平 and 经济水平衡量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些研究发现都是家庭社会经济条件直接作用。李佳丽等(2016)在研究中加入教育期望中介变量,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父母教育期望和学生教育期望间接影响学生补习参与时间,并且父母的教育期望更多是通过学生的自我期望对学生补习参与时间产生间接影响。

资源稀释理论认为家庭中的兄弟姐妹数越多,每个子女所获得的资源会变少。Bray 等(2014)的研究发现在香港兄弟姐妹数对课外补习参与没有显著影响,但对课外补习费用支出有负面影响,兄弟姐妹越多的家庭子女的课外补习支出少(Kim and Lee, 2001)。在韩国,家庭子女数的增多对女孩有不可忽略的负面影响,但对于男孩的影响很小。家庭中第二胎的女孩如果有弟弟出生比有妹妹出生能够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但第二胎是男孩的影响较小(Kang, 2007)。

地区差异明显。课外补习的供给、规模、补习内容和强度以及补习的经济成本等都存在较大的城乡差别(陈全功等, 2011),城市地区比农村地区的家庭参与课外补习概率大(薛海平, 2015),但城市地区繁华街道和非繁华街道居住没有差别(Tansel and Bircan, 2006),表明城市地区无论社会经济位置如何,子女的课外补习费没有差别。高行政区域地区参加非学术性课程补习的学生的比例越高(薛海平和丁小浩, 2009)。母亲参与工作的家庭其子女的课外补习支出少,但也有研究发现母亲工作对家庭辅导费支出影响不显著,父亲的职业没有发现明显的作用(Kim and Lee, 2001)。

2. 学校层面

学校教育的无效率影响学生的课外补习参与,父母会通过课外补习教育补充较差的公立学校教育系统(Kim and Lee, 2004)。当教师的质量提高时,家庭课外补习费用的支出明显下降(Dang and Hai, 2007)。不同类型的学校,韩国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的学生课外补习花费少,师生比高的学校学生课外补习支出更多(Kim et al., 2010)。1974 年推行的高中均衡化政策对减少课外补习需求有反向作用,参加高中均衡化政策(HSEP)城市学校的学生比未

参加学校的学生课外补习支出更多。表明当地的均衡化政策，在促进公立学校教育质量均衡的同时，无法满足家长特殊化要求，而这些家长将需求转向了私人的课外补习教育市场中。在中国，上世纪90年代，政府在名义上取消重点学校的称谓，但从实质上来说，无论在高中阶段还是义务教育阶段，重点学校依然是存在的。而且有研究发现国内重点学校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可能性要显著高于普通学校(钱国英和唐丽静，2009)，但也有研究发现重点中学和非重点中学学生参与教育补习活动的概率没有显著差异(雷万鹏，2005)。

不同的教育层级中，小学和初中学生的课外补习都很明显，但随着教育阶段的提高，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概率下降(Elbadawy et al., 2007)，但课外补习支出显著提高(Dang and Rogers, 2008)。毕业年级的学生参与概率更大。城镇义务教育阶段参加非学术性课程补习的学生的比例较高(薛海平和丁小浩，2009)。张羽等(2014)调查了北京市某示范初中三个年级1635名初中生，使用事件史模型发现学生进入家教市场的概率在四到五年级时最高，且近年来学生课外补习的参与时间向前推移，北京市小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早晚与择校时间表非常一致。

3. 个人层面

通常意义上，我们认为课外补习是一种补差行为，也即在公立的学校教育中成绩水平较弱的学生通过私人的课外补习弥补学校教育中个人知识掌握的不足。然而，实证研究却发现，中国、韩国和日本成绩越好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可能性越大(Stevenson and Baker, 1992; Choi, 2012; 薛海平，2015)，并且这些学生的家庭的课外补习支出越高(Kim and Lee, 2001)。也就是说，在学校教育中拥有优势的学生在课外补习教育中也具有绝对的优势。Kim和Lee(2010)的研究中发现韩国班级成绩最高的10%的学生家庭课外补习支出最多，中国的情况类似，来自高质量学校和班级成绩处于最好和中上水平的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比例明显较高(薛海平和丁小浩，2009)，课外补习教育复制了学校教育中的不平等，强化了所谓高学业成绩学生的这种优势。

自信、学习能力和动机是影响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的重要因素，主动性学习的学生多是主动参与课外补习，积极性较弱的学生多是被同伴、父母或者老师推动者被动参加的。父母也会受其他家长的影响，感到自己的孩子在竞争中落后，因此会使学生参与到课外补习中(Bray and Kwok, 2003)。此外，Stevenson和Baker(1992)发现男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可能性更大，也有研究显示性别对课外补习参与没有影响(Elbadawy et al., 2007)，女生的花费更多(Bray et al., 2014)。

二、“影子教育”效果研究

课外补习教育同学校教育一样,也面临着效率问题。与学校教育的效率评估相比,课外补习教育的效果评价难度更大。学校教育的投入和产出常常用教育生产函数来衡量(Hanushek, 1986),但教育生产函数无法直接衡量课外补习教育的投入和产出。一个原因是课外补习常常伴随着学校教育同时进行,单独估计课外补习的效果需要剥离学校教育的影响。此外,课外补习常常是私人化的,是否接受补习以及接受什么内容的补习内生于家庭背景、学校特征和学生个人特征等其他因素。尽管如此,学术界已有相当的实证研究对此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

1. 未解决内生性问题的研究

Briggs(2001)使用美国 1990—1992 年 NELS 高中学生的数据,发现市场化的考试准备课程使得 SAT 数学成绩提高了 14—15%, SAT 词汇成绩提高了 6—8%。ACT 的数学和英语成绩提高了 0—0.6%,但 ACT 的阅读成绩降低 0.6—0.7%。

Buchmann(2002)使用肯尼亚 1995 年的数据,发现私人课外补习减少了 13 到 18 岁的学生留级的可能性,并且提高了学生的学业表现。越南家庭中小学和初中阶段的课外补习是必需品。不同的学科中,学生的写作和数学成绩没有显著提高,阅读成绩有明显的提高(Kim and Lee, 2001)。不同的是,韩国的一项研究发现校外辅导机构的课前补习对学生的短期和长期学业表现都没有影响(Lee et al., 2004),新加坡学者对上层超级中学的研究发现聘请家庭教师辅导甚至对学生的成绩有负向影响(Cheo et al., 2005)。薛海平等(2014)使用全国六省市 130 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课外补习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有显著的正影响。成绩较好的留守儿童参加课外补习有助于缩小其与非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差距,但成绩较差的留守儿童参加帮助不大。此外,影子教育的参与时间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非线性关系,并且控制父母教育期望和子女自我教育期望,影子教育参与时间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效应下降(李佳丽等, 2016)。

上述研究发现了课外补习参与的不同效果,但这些研究尚未很好地解决课外补习参与的内生性问题,一些研究也忽视了学校层面的因素的影响。解决课外补习参与的内生性是评估课外补习教育效果的一个核心问题,已有研究中多使用工具变量和匹配的方法。

2. 解决内生性问题的研究

德国、越南、日本和韩国的研究发现课外补习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有显著的积极影响。Mischo 和 Haag(2002)调查了德国 1998—1999 年 5 年级到 11

年级的学生，使用匹配的方法设计前后控制组实验。将244名学生平均分为两组，分别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其中，实验组的学生一周参加四次每次90分钟的课外补习，而控制组则没有。通过收集实验前和实验后的数据结果发现接受课外补习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学业动机。Dang(2007)使用1997—1998年的数据研究越南小学和初中生的接受私人课外补习效果，使用课外补习小时费用作为接受课外补习的工具变量，发现课外补习对学生的学业表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Ono(2007)使用日本的1995年数据，选择当地大学的质量作为参加大学准备考试补习的工具变量，研究发现大学入学考试补习(Ronin)通过提高学生进入大学的质量提高了未来的收入。Choi(2012)使用2010年汉城对4年级、7年级和10年级的教育追踪调查(SELS)和2010年的私人课外补习调查数据研究接受课外补习的效果。Choi使用了三个工具变量，即同伴中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非学业性的课外补习的费用和子女的出生顺序。使用匹配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发现课外补习对调查所有年级学生的认知成绩有积极的影响，而且在较低的教育阶段作用越明显。

但一些国家的研究得到了相反的结论。Suryadarma等(2006)利用印度尼西亚2002—2003年四年级学生的数据，通过生产函数模型研究学生成绩的影响因素，学生的课外补习是其中的一个影响因素。研究中使用学校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作为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工具变量，结果发现课外补习对学生的数学成绩或者听写成绩没有显著的影响。Kang(2007)使用出生顺序作为课外补习花费的工具变量。研究假设父母对于不同子女的教育投资是不一样的(例如他们更偏好第一个孩子)，研究发现课外补习的作用不显著。但这个工具变量会通过其他渠道影响学生的学业表现，导致对课外补习的效果的估计高估。父母如果对一个孩子的课外补习投资有特别的偏好，他们在其他方面的投资也会偏好这个孩子(Kang, 2007)。Elbadawy(2009)使用1988年印度劳动力调查和2006年印度劳动力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当地从业人员中在教育部门的比例作为辅导教师供给的代理变量，并作为参加课外补习的工具变量。未使用工具变量的估计发现，课外补习对升入普通高中(而不是职业学校)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使用工具变量进行估计时，其效果不再存在，表明内生性问题是存在的。

衡量中国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效果，Zhang(2013)调查了中国济南市25所高中的6043名学生，使用最好的五个朋友中参加课外补习的人数以及家庭所在地与最近的课外补习机构之间的距离作为课外补习参与的工具变量，并使用多层线性模型、分位数回归和匹配的方法研究了私人课外补习对中国学生高考成绩的影响。发现课外补习对学生高考成绩总体不显著，但对城市学校中成绩较低的学生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薛海平(2015)利用中国家庭入户追踪调查2012年的数据，使用倾向得分

匹配法估算了课外补习对学生成绩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控制学生个体、家庭和学校等影响因素后,参加课外补习对学生数学成绩显著正影响,但对语文成绩的作用不明显。

胡咏梅等(2015)使用 PISA2012 年上海的数据,使用多层线性模型和再加权倾向的分匹配法估算了课外补习教育的净效应。结果发现数学课外补习和科学类课外补习对数学成绩有提升作用,参加语言课外补习对数学成绩有负向影响。而且补习效应在不同群体间存在差异,对经济社会地位较低家庭的学生的效益更强。

已有实证研究显示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效果不一。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是由于课外补习参与的内生性问题,不同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不同,调查对象在不同的教育阶段,导致结果存在差异;第二个可能原因是课外补习对不同学生的影响存在差异,而总体估计的效果可能不显著。例如参与课外补习显著提高了城市学校中成绩较低的学生或质量较差学校的学生的高考成绩,但对农村学生和整体学生的作用不显著(Zhang, 2013)。也就是说,课外补习教育的效果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接受课外补习学生的成绩都能得到理想的效果(胡咏梅等, 2015);第三个原因是不同研究对学习成绩衡量方式不同。例如使用高考成绩、PISA 标准化数学测试或语文和数学成绩,此外年级也有差别,因此,补习效果未得到一致的结论。

三、“影子教育”公平性讨论

尽管课外补习已成为全球一种普遍的教育现象,但它得到的关注仍然少于学校教育。通过梳理课外补习教育研究的相关文献,我们发现以下结论:

首先,国家的公立学校质量与课外补习教育是一种互补关系。父母通过购买课外补习教育补充不满意的公立教育系统,这种需求在竞争激烈的国家或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当文凭与就业紧密挂钩,课外补习作为一种竞争工具为获得高质量高学历的文凭增添砝码。

第二,考虑家庭的微观教育决策,研究发现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居住地、家庭子女数、学校质量、学生学习成绩和性别等因素是影响学生课外补习参与和家庭课外补习支出的主要因素。总体上,具有高社会经济背景的家庭课外补习参与和支出相对更高。

第三,实证研究发现接受私人课外补习的效果不一。有研究发现课外补习对学生的总体学业表现没有显著的影响,但也有研究发现课外补习具有积极效果。此外,不同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效果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中国的传统观念“学而优则仕”根深蒂固,相当家庭对教育非常重视。但由于公立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和选拔性,使得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激烈,

课外补习便成为竞争好学校的一种方式。课外补习教育是市场化的,属于私人产品性质的教育服务,购买与否取决于家庭的需求和支付能力。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家庭最优教育投资决策的条件为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Becker, 1962)。不同于学校教育,课外补习教育不仅成本高,而且收益具有不确定性,购买补习教育需要承担更大的成本和风险。基于理性选择理论,任何家庭都会为子女规避向下流动的风险,高社会阶层需要使子女达到与自己一样或更高的阶层,否则面临向下流动的风险,而对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人而言,损失的只是向上流动的机会(Breen and Goldthorpe, 1997)。教育承担着代际流动的中介作用,高阶层家庭的补习需求可能会更大,这一点反映不同家庭的需求。

因此,无论从支付能力还是从需求来看,即使课外补习市场中存在信息不对称,高社会经济背景家庭依然有更强的投资动力。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的课外补习机会和资源获得有明显的差别,薛海平(2015)认为这种差别成为城乡和阶层差距在代际间维持的一个重要通道,课外补习教育的社会再生产功能削弱了当前政府在学校教育中公平政策中的努力。这种优势是否会产生新的不平等问题?

已有研究发现参加私人课外补习对学生的学业表现的影响不确定,不同学生参与补习的效果是有差异的。在中国,完全剥离学校教育的作用后,课外补习教育对成绩较差或来自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学生的影响更大(Zhang, 2013; 胡咏梅等, 2015)。从补习的效果来看,课外补习的效果因人而异。学校教育中优势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教育的效果并不明显,而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学生补习效果更好。这表明市场化的补习为学校教育中处于弱势的学生另辟蹊径,他们在公立学校教育系统中成绩落后或无法接触到优质教育,课外补习教育资源可以弥补他们在学校教育中资源获取的不足,有利于弥补公立学校教育的不均等;但从补习的机会来看,课外补习教育是一种提高策略,研究表明学校教育中具有优势的学生更多的参加课外补习教育,高经济社会背景的家庭子女有明显的优势。

因此,如果剔除预算约束的问题,课外补习教育似乎更是学校教育中处于劣势的学生自我提升的一条新路径,为学校教育中的弱势学生提供了新的机会。但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课外补习教育资源获取机会的均等性。如果不同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机会相等,则参与课外补习可以一定程度上缩减家庭经济社会地位产生的成绩差异。

我们在讨论课外补习教育的公平性时需同时考虑补习机会和补习效果。当课外补习教育存在并不断盛行时,如果国家能够对课外补习的质量和费用进行有力的监管,让弱势家庭也有机会购买补习教育,似乎对于学校教育补充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当然,这不是在鼓励课外补习教育,实现教育的公平

依然在于公立学校教育的均等性，当优质的学校教育能够满足大众需求时，家长对于课外补习教育的需求会大大减少。

四、未来研究的展望

有关课外补习参与、课外补习支出、课外补习效果等三个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根据前面的文献回顾和讨论，未来的相关研究有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加深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首先，课外补习教育与公立学校教育系统的关系研究。课外补习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影子，学校教育系统的变化如何影响课外补习教育。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均衡化发展、高中教育阶段“超级中学”现象以及大学扩招、高等教育学校分层等发生在公立学校教育系统的变化，是否会对课外补习教育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包括课外补习教育市场的变化，还包括家庭对于课外补习教育的需求等。回答课外补习教育随公立学校政策的变化而变化，能更好地全面地理解课外补习教育存在的意义，从而对研究公立学校教育也有借鉴意义。

第二，课外补习教育成本和收益研究。已有研究中对家庭的课外补习支出和课外补习效果已经进行了有意的探讨，但缺少成本效益分析。参与课外补习，家庭对其投入远高于学校教育，而这种投入的效益如何很少进行探讨。课外补习教育有多种形式和不同内容，不同教育阶段，不同层次的学生参加不同形式课外补习教育的效果分别是怎样的，需要更多地研究进行回答。正是因为目前课外补习效果的估计的不足，导致家庭对课外补习教育的跟风现象，课外补习教育的成本效益分析对于家庭理性投资选择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课外补习教育公平和效率研究。市场化的课外补习教育产生和发展基本都遵循市场规律，价格由市场决定。这样一种市场支配的教育资源，对于收入水平低的家庭来说，购买的成本相对比较高，已有研究表明优势社会阶层获得课外补习教育的机会更大。未来需要将补习机会和补习效果结合起来研究，探讨不同社会阶层的课外补习教育获得的同时，延伸不同社会阶层子女接受课外补习效果分析。课外补习效果不仅仅包括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也包括对升学以及学校质量选择的影响。当优势社会阶层在课外补习教育市场中拥有绝对优势，同时将这种优势带回公立学校教育系统时，课外补习教育将进一步强化学校教育中的不公平问题，这也是后续需要更加关注的问题。

课外补习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教育现象，课外补习教育在教育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研究课外补习教育能为家庭的教育投资提供有益的信息支持，同时为理解主流学校教育提供新的视角，未来期待更多课外补习教育的研究，以期为认识和理解中国的课外补习教育提供经验支持。

[参考文献]

- 陈全功、程蹊、李忠斌，2011：《我国城乡补习教育发展及其经济成本的调查研究》，《教育与经济》第2期。
- 丁小浩、翁秋怡，2015：《权力资本与家庭的教育支出模式》，《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3期。
- 胡咏梅、范文凤、丁维莉，2015：《影子教育是否扩大教育结果的不均等——基于 PISA2012 上海数据的经验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3期。
- 李佳丽、胡咏梅、范文凤，2016：《家庭背景、影子教育和学生学业成绩——基于 Wisconsin 模型的经验研究》，《教育经济评论》第5期。
- 雷万鹏，2005：《高中生教育补习支出：影响因素及政策启示》，《教育与经济》第1期。
- 钱国英、唐丽静，2009：《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机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武汉、深圳的调查》，《教育财会研究》第3期。
- 薛海平，2015：《从学校教育到影子教育：教育竞争与社会再生产》，《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3期。
- 薛海平、丁小浩，2009：《中国城镇学生教育补习研究》，《教育研究》第1期。
- 薛海平、王东、巫锡炜，2014：《课外补习对义务教育留守儿童学业成绩的影响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3期。
- 薛海平、李静，2016：《家庭资本、影子教育与社会再生产》，《教育经济评论》第4期。
- 张羽、刘娟娟、李曼丽，2015：《北京市小学生进入家教市场的早晚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教育发展研究》第4期。
- Baker, D. P., M. Akiba, G. K. LeTendre and A. W. Wiseman, 2001, “Worldwide Shadow Education: Outside-school Learning, Institutional Quality of Schooling, and Cross-national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23 (1): 1-17.
- Becker, G. S., 1962,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alysi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0(5): 9-49.
- Bray, M., 1999, “The Shadow Education System: Private Tutor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lanners”, *Fundamentals of Educational Planning Series*, Number 61.
- Bray, M. and P. Kwok, 2003, “Demand for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 Conceptual Considerations and Socio-economic Patterns in Hong Kong”,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2(6): 611-620.
- Bray, M., S. Zhan, C. Lykins, D. Wang and O. Kwok, 2014, “Differentiated Demand for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 Patterns and Implications in Hong Kong Secondary Education”,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38(1): 24-37.
- Breen, R. and J. H. Goldthorpe, 1997, “Explaining Educational Differentials towards a Formal Rational Action Theory”,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9(3): 275-305.

- Briggs, D. C. , 2001, "The Effect of Admissions Test Preparation: Evidence from NELS: 88", *Chance*, 14(1): 10-18.
- Buchmann, C. , 2002, "Getting Ahead in Kenya: Social Capital, Shadow Education, and Achievement", *Schooling and Social Capital in Diverse Cultures*, 13: 133-159.
- Cheo, Roland and E. Quah, 2005, "Mothers, Maids and Tutors: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Their Effect on Children's Academic Grades in Singapore", *Education Economics*, 13 (3): 269-285.
- Choi, J. , 2012, "Unequal Access to Shadow Education and Its Impacts on Academic Outcomes: Evidence from Korea", *Spring 2012 meeting of ISA RC*, 28: 10-13.
- Dang, H. A. , 2007, "The Determinants and Impact of Private Tutoring Classes in Vietnam",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6(6): 684-698.
- Dang, H. A. and F. H. Rogers, 2008, "The Growing Phenomenon of Private Tutoring: Does it Deepen Human Capital, Widen Inequalities, or Waste Resources?",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3(2): 161-200.
- Elbadawy, A. , R. Assaad, D. Ahlburg and D. Levison, 2007, "Private and Group Tutoring in Egypt: Where is The Gender Inequality?", *Economic Research Forum Working Papers*, No. 0429.
- Elbadawy, A. , 2009, "The Effect of Tutoring on Secondary Streaming in Egypt", Annual Meeting of the Canada Economic Associ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Ontario.
- Ha, T. T. and T. Harpham, 2005, "Primary Education in Vietnam: Extra Classes and Outcome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Journal*, 6(5): 626-634.
- Hanushek, E. A. , 1986, "The Economics of Schooling: Production and Efficiency in Public School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4(3): 1141-1177.
- Kang, C. , 2007, "Does Money Matter? The Effect of Private Educational Expenditures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704.
- Kim, K. M. and D. Park, 2010, "Impacts of Urban Economic Factors on Private Tutoring Industry", *Asia Pasific Education Review*, 13: 273-280.
- Kim, S. and J. H. Lee, 2004, "Private Tutoring and Demand for Education in South Korea",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ilwaukee.
- Kim, S. and J. H. Lee, 2010, "Private Tutoring and Demand for Education in South Kore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8(2): 259-296.
- Kim, S. and J. H. Lee, 2001, "Demand for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al State: Private Tutoring in South Korea", Available at SSRN 268284.
- Kulpoo, D. and M. Soonarane, 2005, "The SACMEQ II Project in Mauritius: A Study of the Conditions of Schooling and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Harare, Zimbabwe: SACMEQ*.

- Kwak, B. S. , 2004, “Struggle Against Private Lessons in Korean Education Context”, in *28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Pacific Circle Consortium*,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21-23.
- Lee, J. T. , Y. B. Kim and C. H. Yoon, 2004, “The Effects of Pre-Class Tutoring on Student Achievement: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Education in Korea”, *KEDI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olicy*, 1(1): 25-42.
- Mischo, C. and L. Haag, 2002, “Expans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Private Tutoring”,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17(3): 263-273.
- Onsomu, E. , J. Nzomo and C. Obiero, 2005, “The SACMEQ II Project in Kenya: A Study of the Conditions of Schooling and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Harare, Zimbabwe: SACMEQ*.
- Ono, H. , 2007, “Does Examination Hell Pay Off? A Cost-Benefit Analysis of ‘Ronin’ and College Education in Japan”,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6(3): 271-284.
- Russell, N. U. , 1997, “Lessons from Japanese Cram Schools”, *The Challenge of Eastern-Asian Education: Implications for America*. 153-170.
- Smyth, E. , 2009, “Buying Your Way into College? Private Tuition and the Transition to Higher Education in Ireland”,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35(1), 1-22.
- Stevenson, D. L. and D. P. Baker, 1992, “Shadow Education and Allocation in Formal Schooling: Transition to University in Jap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6): 1639-1657.
- Suryadarma, D. , A. Suryahadi, S. Sumarto and F. H. Rogers, 2006, “Improving Student Performance in Public Primary School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Education Economics*, 14(4): 401-429.
- Tansel, A. and F. Bircan, 2006, “Demand for Education in Turkey: A Tobit Analysis of Private Tutoring Expenditures”,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5(3): 303-313.
- Zhang, Y. , 2013, “Does Private Tutoring Improve Students’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 Performance?: A Case Study from Jinan, China”,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32: 1-28.

A Literature Review on Shadow Education

WENG Qiu-yi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

Abstract: Private tutoring is also known as “shadow education”. Shadow education has become worldwi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 household decision-making, this paper

overviews the research on the demand of shadow education and the effect of shadow education.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macro factors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ducation and micro factors such as family, school and individual level, which determine the needs of private tutoring, and the effect of private tutoring has obvious heterogeneity. Finally, the author tries to explain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and the future research is prospected.

Key words: shadow education; private tutoring; the demand of private tutoring; the effect of private tutoring

(责任编辑: 刘泽云 责任校对: 刘泽云 孙志军)